

近年来,在国家立法和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的专门学校都在开展专门教育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理论界主要集中于专门教育与专门矫治教育的关系以及专门学校功能实现的宏观研究等,缺乏对专门学校功能实现的微观研究,特别是专门学校的课程建设研究有待深化。因此,本文聚焦于专门学校法治教育课程建设研究,以期提高专门学校的法治教育质量,使罪错未成年人增强法律意识、远离犯罪。

一、专门学校法治教育课程建设的重要意义
专门学校的教育矫治功能要通过一系列课程教学来实现,其中法治教育课程教学必不可少。

(一)促使罪错未成年人敬畏法律、远离犯罪的需要

根据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刑法修正案(十一)》以及专门学校实践来看,专门学校的教育对象是严重不良行为为未成年人、已经触犯我国刑法规定,但由于未达刑事责任年龄不构成犯罪的未成年人或者严重危害社会的未成年人。这些未成年人之所以出现罪错,重要原因之一是其法律意识淡薄,对自身行为违法性与严重后果认识不足。个别未成年人甚至故意利用刑事责任年龄放纵自己的行为,侵害他人、危害社会,藐视我国刑法。比如,2019 年大连发生 13 岁男孩蔡某杀害女孩琪琪,并抛尸灌木丛中的案件等。而专门学校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要阻却罪错未成年人滑向犯罪的深渊,教育他们重新回归正常社会。这就要求专门学校通过法治教育课程有效开展,纠正罪错未成年人对法律的一些错误认知,使他们认识到一切违法犯罪行为是要付出代价的,从而使他们强化规则意识,服从法律的权威。

(二)有效落实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机制的需要

从未成年人犯罪规律来看,如果对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放任不管或者干预无效,这些未成年人往往走向违法犯罪道路。因此,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二条规定:“坚持预防为主、提前干预,对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及时进行分级预防、干预和矫治。”该法第六条把教育严重不良行为为罪错未成年人的任务分配给专门学校。因此,在预防和减少罪错未成年人犯罪的分级干预机制中,专门学校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近些年,我国未成年入犯罪整体呈上升趋势。2020-2024 年,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数分别为 5.5 万人、7.4 万人、7.8 万人、9.7 万人,年均增长 21.5%。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专门学校的重要的临界预防和再犯预防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目前,专门学校相关配套措施还不够健全,矫治成效有待进一步提升,优化包括法治教育课程在内的相关课程建设势在必行。

(三)建设法治中国的需要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法治的进

专门学校法治教育课程建设探究

■ 张红侠 周东虎

步,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建设法治中国”的目标。法治中国的实现需要法治社会支撑。而法治社会建设需要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增强全民法治观念。为提升全民的法治素养,不仅全国开展全民普法活动,2016 年教育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还颁布《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要求大中小学开展法治教育。2018 年 8 月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任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我们坚持把全民普法和守法作为依法治国的基础性工作,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将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专门教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担负着罪错未成年人的专门法治教育任务,还担负着青少年的一般普法任务。因此,专门学校要为建设法治中国作出自己的贡献,必须有效开设法治教育课,培育和提升罪错未成年人的法治素养。

二、专门学校法治教育课程建设面临的现实困境

我国专门学校法治教育课程建设既继承工读学校的经验,也吸收普通学校的做法,成效显著。但是由于受专门学校历史的影响、专门教育立法不完善等问题,其法治教育课程建设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一)法治教育课程教学内容的体系性、针对性不强

专门学校承担着罪错未成年人一般法治教育的任务,主要使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道德与法治》《政治与法治》《法律与生活》。同时,专门学校还担负着预防罪错未成年人犯罪的任务。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专门学校应当对接受专门教育的未成年人分级分类进行教育和矫治,有针对性地开展道德教育、法治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然而,一些专门学校的一般法治教育内容与预防罪错未成年人犯罪内容的先后关系、比重没有统一标准,特别是对于罪错程度不同、在专门学校期限长短不一的罪错未成年人,一些专门学校也没有相对应的培养方案、教学大纲和教材。据访谈发现,一位被单位领导通知到专门学校上课的基层法院庭法官不知道讲什么,只好根据自己的办案经验去讲课。这就会出现学生获得的法律知识呈现碎片化现象、针对性不足的问题。

(二)法治教育课程教学方法、手段较为单一
教学目标的完美实现需要恰当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而专门学校的学生罪错程度不一,并且学生的思想、认识处于不断变化中。这就要求课程应当具有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然

而,专门学校法治教育课程教学方法、手段较为单一,不能很好地适应法治教育内容的需要。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主要采用班级组织教学,未充分考虑不同学生的法律欠缺、法治意识淡薄的具体情况,导致教学效果大打折扣。二是部分教师仍然采用填鸭式教学法,较少运用智慧教学手段,未能结合法治教学内容本身特点进行教学。三是主要在教室开展法治教育课程教学,教学场所单一,实践教学效果有待提升。法律的实践性很强,特别是青少年还处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过渡期。这一年龄段的学生需要老师带领到法院、检察院、律所、法律观护基地等,体验、观察法律的运作,才能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因此,要提升专门学校的法治教育效果,就必须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

(三)法治教育师资队伍专业性、稳定性不强

目前,师资队伍专业化、稳定性不强问题是困扰专门学校法治教育课程建设的关键问题。专门学校法治教育教师多由专职教师和兼职教师组成。其专职教师主要是指专门学校的思政教师,其兼职教师往往是专门学校所在地的法官、检察官、律师、民警、司法行政人员等。然而,一些专门学校的思政教师法律知识本身比较欠缺,也缺乏系统的专门教育培训,而且一些思政教师职业成就感比较低,认为专门学校学生难管、升学率低等,有机会就想跳槽。同时,受社会偏见的影响,一些专门学校招聘专任教师也存在困难。专门学校兼职法治教育课程教师,虽然大多数具有系统的法律知识、法治实践经验丰富,但是他们往往自身业务繁忙,大多没有专修教育学、心理学知识,不一定熟悉教学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教学效果需要进一步观察。这样的法治教育师资状况,严重影响着专门学校的法治教育质量。

(四)法治教育课程考核评价体系待完善

课程考核评价是检验、反馈课程实施及教学效果的重要手段。目前,国家没有出台关于专门学校建设和管理的法律法规。在实践中,一些专门学校的法治教育课程考核评价体系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一些专门学校法治教育课程评价主体单一。主要是由任课教师对学生进行评价,学生自评与互评流于形式。其次,一些专门学校往往直接套用普通学校的教学评价标准。而专门学校与普通学校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难度等方面有较大不同,适用同一评价标准不科学,难以反映出专门学校的法治教育动态,最后,一些专门学校没有建立个性化的动态课程考核机制。而专门学校的学生入学前具体情况不一,入学后学习成效也处于不断变化中。

红医文化融入当代医学生医德教育实践路径研究

■ 张林玉 沈 洋*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任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用好红色资源,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红医文化发韧于中央苏区医疗卫生实践,历经抗战时期“马背医院”、新中国成立初期巡回医疗等历史淬炼,形成了以政治忠诚、技术为无、无私奉献为特质的医学文化谱系,成为中国特色医学人文教育特有的精神标识。在健康中国建设背景下,将红医文化有机融入医学教育全过程,不仅是赓续红色卫生工作者的价值基因,更是构建价值引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三维融合的育人新范式,从而系统提升医德教育的时代性与实效性,有力回应新时代医学教育“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的深层诉求。

二、红医文化融入当代医学生医德教育的必要性

(一)防范化解医患信任的现实需求

随着医学技术的飞速迭代,部分医学生易陷入“技术至上”的认知误区,在职业实践中可能弱化对患者的的人文关怀,这一倾向往往成为医患纠纷的潜在诱因。而红医文化倡导的德术双馨,恰是对这种认知偏差的有力矫正——它深刻提醒医学生:医疗绝非单纯的技术操作,更是对人民生命与健康的全然关照。根据《中国医患社会心态调查报告》显示,42.6%的医务工作者将沟通障碍归因于职业道德教育缺位,这一数据揭示了传统医德教育在价值传导机制上的失效。在革命历程中,众多红医前辈榜样展现出卓越的医患沟通艺术与崇高职业精神,他们不仅是当代医学生学习的楷模,更是医学教育“立德树人”的宝贵资源,也为培育既有精湛医术又具人文温度的新时代健康守护者提供了价值根基。将红医文化融入医德教育体系,既是补全职业道德教育短板的必然选择,更是防范化解医患信任危机的现实需求。

(二)价值观冲突下医学生职业观念的纠偏诉求

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多元文化思潮交织涌入,其中一些利己主义的价值导向,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代医学生的职业选择——部分医学生在“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功利主义”等观念影响下,变得过度重视物质利益,缺乏对理想信念的执着与坚守;过度重视个人利益、忽视社会责任;过度重视生活品质、忽视道德理想等。例如,部分医学生对基层医疗岗位产生抵触,缺乏扎根基层的意愿。在就业选择中,多数医学院毕业生将三甲医院视为执业首选,追求更优渥的工作环境与发展平台,因此,基层医疗机构持续面临人才“引不进、留不住”的困境,人才流失问题日益突出。另一方面,也使得大城市医疗系统的就业竞争日趋激烈,部分毕业生面临“想进进不去”的就业难题,形成了医疗人才资源分布失衡的结构性矛盾。而红医文化所承载的崇高精神与感人事迹,为

重塑医学生职业价值观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和价值引领。

(三)培养卓越医师的发展诉求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加强救死扶伤的道术、心中至爱的仁术、知识扎实的学术、本领过硬的技术、方法科学的艺术的教育,培养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人民健康守护者。红医文化是医学教育的宝贵教材资源,绝非可弃之不顾的历史遗存,反而应当在时代发展中不断传承发扬,并在医德教育体系中得到充分彰显与深化。当前,尽管红医文化已在医学生思政课程中有所渗透,但这种融入仍停留在表层——或仅作为零散案例呈现,或缺乏与当代医德实践的深度衔接,尚未形成系统化的教育闭环。因此,以红医文化为纽带,推动其与医德教育的深度融合、走深走实,既是响应医学教育改革的必然举措,更是提升医学人才培养质量、培育新时代人民健康守护者的迫切需求。

三、红医文化融入医学生医德教育的实践路径

(一)深挖红色资源,丰富医学生医德教育教材内容

当前,学界对红医精神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取得了一些理论成果,但是研究多局限于红色医生的教育史和红十字卫生工作史,且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远远不够。鉴于此,医学院校应当深刻认识到红医精神在思政教育中的价值,积极挖掘校内学术资源,设立专项研究经费以支持红医精神研究,提升思政课教师对红医精神的研究与实践能力。鼓励教师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挖掘并整理红医精神的内涵、价值、历史背景及当代意义,从而在医学院校内营造浓厚的红医精神学习与研究氛围。在教材内容的优化上,要秉持学术严谨性,既要确保历史事件的准确性,又要注重医学伦理理论的与时俱进。因此,要结合现代医学伦理学说的最新研究成果,对历史人物与事件进行客观、全面地评价,避免简单化的英雄崇拜或片面化的历史解读。同时,教材内容的的设计应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案例分析、角色扮演、情境模拟等多种教学手段,引导医学生深入理解红色资源背后的医德内涵,促进其医德认知、情感与行为的全面发展。

(二)红医文化赋能医德教育

传统的理论灌输模式难以真正触动人心、塑造人,应积极构建以学生为中心、以情境为载体、以体验为导向的新型教学体系。一是要深化思想引领,强化价值观念导向。致力于培育大学生的家国深情与时代担当,引领医学生将个人价值观与红医前辈的崇高精神相契合,激发他们的责任感与职业道德共鸣。而从升华其职业荣誉感。二是要增强教育的亲和力与说服力,牢牢把握话语的引领力。需将以往抽象、单调的传统教育模式转化为青年人乐于接受的生动形式,使医德教育更具吸引力和渗透力,进一步巩固医学

生的价值认同与职业归属感。通过案例教学、叙事医学、情景模拟、实践研学等多种方式,将红医人物、红医故事、红医精神有机融入医学伦理、临床沟通、医学史等课程模块,引导医学生在沉浸中感知、在思考中认同、在实践中践行。例如,组织学生排演红医题材情景剧、赴红色医疗旧址开展现场教学、采访老一辈医务工作者等,化抽象为具体、化被动为主动,从而实现红医文化从“进课堂”到“进头脑”的升华,真正塑造具有红色基因、人文精神和家国情怀的新时代医学人才。

(三)营造校园文化氛围,拓宽医德教育渠道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创造环境,同时,环境也创造人。”校园文化是医德教育的隐性课堂和重要载体,可将红医精神中的道德元素融入校园文化设计理念中,成为积极而生动的“无声老师”,针对性地培育医学生医德。浓厚的红医文化校园氛围,能够打破传统医德教育局限于课堂的边界,构建全方位、沉浸式的育人环境。高校可依托主题景观、文化长廊、医史馆等设施,生动呈现红医历史与精神,使学生在日常学习中潜移默化地接受熏陶;同时,广泛开展红色医学主题讲座、征文比赛、微电影创作、实践服务等多元活动,推动红医文化融入学生社团、志愿服务和临床实践中,实现从“认知”到“认同”、从“课堂”到“生活”的延伸。这种氛围营造和渠道拓展,不仅丰富了医德教育的形式与内涵,更助力于实现价值引领的情感内化和行为转化,为培育兼具人文精神与红色基因的新时代医学人才提供持续文化滋养。

四、结语

红医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宝贵医疗卫生文化瑰宝,蕴藏着深厚的医德教育资源与历史智慧,是滋养我国一代又一代医学人才的精神源泉。将红医文化有机融入当代医学生的医德教育实践之中,不仅能够为医学生构筑起坚实的政治素养基石,更能在专业技能锤炼与职业道德的塑造上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全面提升医学生的医德境界与人文关怀能力。医学院校作为医学人才培养的摇篮,肩负着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医精神的神圣使命。因此,积极探索并实践红医文化与医德教育深度融合的新路径、新方法,显得尤为重大且迫切。这要求我们不仅要深入挖掘红医文化的精神内涵与时代价值,更要创新性地将其融入课程体系、实践教学、校园文化等多个维度,形成一套系统化、科学化的医德教育体系。

基金项目:贵州省高等学校教育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项目“教育强国战略下医学生数字素养培养体系构建研究”、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三全育人’理念下高校‘马院+书院’协同育人模式实践探索”、贵州省高校思政课优秀教学团队“以‘文化人:校史文化赋能思政课教学团队”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单位:遵义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创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问题·专题·主题·课题”教学模式的时代意蕴

■ 何士凤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在 2022 年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在 2022 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育壮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创新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党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具有引领性、全局性影响的学科,加快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是契合时代需求与学科发展的关键之举。

思政课是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性载体与关键路径。作为高校思政课的核心课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以下简称“原理”课),对“05 后”大学生系统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塑造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重要作用。“原理”课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创新引擎,是驱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新时代新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动力源。综合学界研究来看,现有教学研究主要从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重难点问题、方法应用等方面探索“原理”课教学改革,并取得长足进展,但针对“原理”课教学模式创新的探究相对较少。在充分挖掘“原理”课新教材、配套教师、辅导用书的基础上,立足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诉求,把握“05 后”大学生的学情现状及其对课程的困惑诉求,结合“原理”课教学过程的现实状况,可以从“问题·专题·主题·课题”四题及其融合出发探索“原理”课教学模式创新,提升“原理”课针对性和吸引力。

在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大背景下,“问题·专题·主题·课题”为牵引创新“原理”课教学模式。其一,“问题”层面,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理实结合”问题意识,形成三条“问题链”,即融入重大基础理论问题,回答“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归根到底是谁在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结合理论热点前沿问题,回答青年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聚焦青年成长成才问题,回答大学生的真问题、真困惑、真迷惘。其二,“专题”层面,透过“问题链”设计“专题链”,注重将三条“问题链”与配套课程中的八个专题的理论点汇聚、共融,将课程内容划分为若干紧密相关的专题,同时在具体专题教学设计中清晰展现重点难点堵点易错点,瞄准学生“真问题”精准供给。其三,“主题”层面,以引导青年自觉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为主,通过

动,增强学生监护人的责任意识,使监护人帮助学生提高法律意识。同时,建立长期的专门学校校外法律实践基地,条件允许的学生可以通过线下或线上参与校外法律实践活动、社会治理,主动构建自己的法律认同、法律实践能力。

(三)构建专业化、稳定化法治教育师资队伍

前文提到,不专业、不稳定的教师队伍是制约专门学校法治教育的难题。一些地方认识到这一问题,寻求突破师资瓶颈。例如,为保障师资队伍,2024 年海南省教育厅等十部门印发《海南省专门学校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规定:“专门学校教职人员编制从中小学教职工专项编制中调剂安排;专门学校教师享受专门教育津贴;加强与教育矫治密切相关的社会学、心理学、犯罪学等相关专业课程的培训等”。这些改革举措从制度上保障了法治教育师资力量。当然,专门学校的法治教育教师队伍还在建设中。专门学校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借鉴一些专门学校的创新做法,从纠正教师对专门学校的偏见、教师招聘、培训、激励和保障措施方面加强专、兼职教师队伍制度化建设,不断提升法治教育教师队伍素养。

(四)改革法治教育课程评价体系

为充分实现课程评价的功能,专门学校应制定科学的法治教育评估方案和考评细则。实施动态考核,不断激励学生进步。具体要注意以下几点:1. 专门学校应根据不同的法治教育课程特点,制定不同的教学评价标准。比如,法治基础知识课,既考察学生基本法律知识的记忆能力,又检验其法治精神和原则的理解。法治实践课,注重考察学生运用法律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思维和能力。2. 采用多元化的评价主体。实施教师评价、学生自评与互评、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价等多元评价,确保评价的客观性和公正性。3. 细化评价方式。明确课程总评成绩由平时评价占 40%+期末评价(毕业离校评价)占 60%构成。在平时评价中,借助知识图谱对学生学习过程进行全程跟踪与管理,如学生严重不良行为的纠正情况、学生平时遵守校规情况、课堂纪律情况、学生在课堂及法治实践中的表现、课后作业等。在期末评价中,通过课程考试判断是否达成课程目标。

四、结语

专门学校法治教育课程教学是专门学校教育矫治罪错未成年人的重要措施。然而,一些专门学校由于历史与现实原因,其法治教育课程建设存在一些问题。可喜的是不少专门学校开展法治教育改革,并取得了良好效果。相信越来越多的专门学校会重视法治教育课程建设,其法治教育课程建设会高质量发展。

基金项目:宿迁市法学会研究课题“新时代专门学校的功能及其实现研究”(项目编号:SFH2025B01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宿迁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